

“言说困境”的消解与“言说方式”的确立

——林纾在杭州期间的翻译转向

杨亿力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1899至1900年,在杭州谋生的林纾出版了首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魏易合作完成了《黑奴吁天录》的翻译并为《译林》杂志作序。这对林纾的翻译和人生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受益于杭州地区的同乡社交网络,林纾依靠《茶花女》的出版摆脱了困扰其多年的“言说困境”并获得巨大的士林声望。与此同时,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及“助译”等现实条件的制约,为了更好地言说己见,林纾关注的翻译对象渐由西方政史著作转向小说。在杭时期是林纾翻译的重要转折,也为其后来的人生路径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 言说困境;言说方式;杭州;林纾;翻译转向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9)05-0427-06

Resolving the “plight of narr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way of narration”:

Lin Shu's translation turn during his stay in Hangzhou

YANG Yili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From 1899 to 1900, Lin Shu, who made a living in Hangzhou, published his first translation of *La traviata*. He cooperated with Wei Yi to complete the translation of *Uncle Tom's Cabin*, and wrote the preface for the magazine *Yilin*. The events above had a great impact on Lin Shu's translation and his life. Benefiting from the social network of Fuzhou scholars in Hangzhou, Lin Shu got rid of the “plight of narration” that had beset him for many years and gained a great reputation as a scholar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La traviata*. Meanwhile, influenced by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at that time and constrained by practical conditions such as “assisted translation”, Lin Shu gradually shifted his focus from western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orks to novels in order to express his opinions better. The Hangzhou period wa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Lin Shu's translation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his later life.

Keywords: plight of narration; way of narration; Hangzhou; Lin Shu; translation turn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林纾是今人观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社会变革历程的一个重要视角。关于林氏翻译的分期,学者们已详有论述,具有代表性的是张俊才与钱钟书。张氏以1907年与1911年为界,将林纾的翻译事业分为三个阶段。这种划分侧重于中国社会的

宏观背景——1908年是光绪帝及慈禧太后去世之年,而1911年则是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之年。^{[1]94}钱先生则认为前期的林译作品“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到了后期却充满了淡漠或冷淡。前后两期则以1912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间的界标”^{[2]91}。

收稿日期: 2019-09-0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基地重大项目(FJ2018JDZ027)

作者简介: 杨亿力(1986-),男,福建福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福建地域文化。

实际上,若以地域论之,林纾的一生又可分为在闽、在杭及在京三阶段,其中在杭州时期为1899至1900年,是最为短暂的一段。据其《林迪臣先生寿序》所述:“迪臣先生以光绪丙申领杭州,余以己亥应陈吉士大令之聘至杭州。郡治、县治相比也,间日辄造先生。”^{[3]22}林迪臣即时任杭州知府的福州士人林启,陈吉士即时任余杭知县的陈希贤,二人皆为林纾同乡进士。光绪己亥(1899),林纾受陈氏之邀来杭,在其家中设馆教授希贤弟希彭及子体仁、体立,又任教于林启治下的东城书院,还与同乡、时任海宁知县林孝恂之子长民、肇民、尹民等结下了师生之谊。1900年,林启去世,不久林纾便离杭赴京另谋生计。显然,此时的林纾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千千万万的落第举人一样,靠束脩和同乡官员的资助来维持生计。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的代表性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下文简称《茶花女》)得以出版,与魏易合作翻译了《黑奴吁天录》,还参与了杂志《译林》的策划与出刊,并为其作序。

那么,在杭时期的上述事件对林纾的翻译、思想观念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今人应该如何评价这个时段的意义?本文试图立足晚清时期的文化语境和传统士人的社会身份,以林纾及其好友们的诗文、信件为依据,通过梳理有关《茶花女》出版、《黑奴吁天录》翻译、《译林》出刊等事件的相关细节,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从而进一步勾画林纾的思想变化和人生走向,进而考察传统士人对于翻译等新知识的接纳过程,以期对学界有所补益,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茶花女》的出版与林纾的“言说困境”

(一) 林纾的“言说困境”及其成因

在晚清的社会语境中,林纾算是一位出身贫寒、蹭蹬科场多年的落魄士子。自光绪八年(1882)中举后,他曾数次赴京参加会试,但都铨羽而归。他“木强多怒”,喜怒形于色、激愤溢于言表,以至于在来杭之前,常被视为有些“另类”的“狂生”,为人所轻。在《赠陈生序》中,他吐露出了郁积多年的辛酸:

国俗之敝,士贱若不。予以有忧国之容,发言曹中,仰屋他顾而弗答,犹宽

以见待者也。慷慨相和诺,既去,摹拟其状以为乐笑。彼其心岂仇视君国第强,以所不适闻,若立丧其科第、富贵之美趣,故并忧国者而亦恶之。光绪甲申迄于庚子,余每有论著,未尝逃恶笑于交游之间,其深许之者,独一林杭州,其次高啸桐,其次陈生杰士。^{[3]13-14}

陈生即林纾的学生、陈希贤之弟希彭(字杰士)。“光绪甲申”即1884年,时年33岁的林纾正是一位有志于场屋、心忧天下的青年才俊。然而,直到光绪庚子(1900),他总是为士人所轻——“每有论著,未尝逃恶笑于交游之间”,那些忧国忧民的言论极难获得同侪的倾听与认可。在林纾眼里,真正认同己见的仅有在杭的几位同乡:林启(林杭州)、高啸桐(高凤岐)和陈希彭。高凤岐与林纾同年中举,此时与三弟凤谦(梦旦)皆在林启幕僚中。有意思的是,据林启后人回忆:“林启很敬佩林琴南先生的文采,两人友谊深厚。平时交往,相互切磋诗文、美学,不谈政事,不谈自己的政绩。”^{[4]77}若政见相投,两人必有所交流。照此推测,林启对于林纾的某些见解也持保留的态度。

这种无处言说、鲜被认可的境遇让林纾陷入了痛苦的“言说困境”。这种“困境”的本质是话语权的缺失。它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在推崇科名的年代,一个落魄举人的言论自然难为众人所重;另一方面,时人似乎对林纾的诗文创作和学术见解不以为然。在诗歌创作方面,汪辟疆曾引用陈宝琛的话评价林纾:

余曾见其早岁所撰《闽中新乐府》一卷,即当时盛传闽中者。实则摭实传闻,略含讽刺,诗亦平平。后乃稍稍与文士往还,眼界较宽,而诗亦不出梅村末派。以其济以时务,在尔时风气中,固易得名也。及与王寿昌同译《茶花女》,名乃大显。居旧京时,海内诗人以陈散原、郑海藏为领袖,林氏遂弃其向所尊崇之江左派而不为,数年不作诗。辛亥物改后,乃又稍稍为之。已一变其故步,而清真挺秀之篇,往往遇之。陈陟庵尝语余:“琴南本俗学,所谓中年出家也。”盖以

此云。^{[5]198}

“中年出家”在陈衍《近代诗钞》亦有引用,可见当为彼时士林之共识。梅村即清初以歌行闻名的吴伟业。在时人眼中,林纾虽有《闽中新乐府》等作品,但“不出梅村末派”,且“初本俗学”“诗亦平平”“非其至者”,与当时以陈三立(陈散原)、郑孝胥(郑海藏)为代表的诗坛主潮相去甚远,并无太多可取之处。

对于林纾的学识,人们也不甚重之。钱钟书先生曾言:

琴南一代宗匠,在京师大学堂时授《仪礼》,不识“澹”字,欲易为“酒”字,又以“生弓”为不词,诸如之类,卤莽灭裂,予先后为遮丑掩盖,不知多少……任京师大学教习时,谬误百出。^{[6]40}

上文所记录的,是钱氏的老师、林纾同乡陈衍的评价。在考据学风盛行的清代,此类错误显然会让人贻笑大方。很明显,陈宝琛、陈衍等同乡对于林纾的才华、学识并不看好。甚至,林纾也感到自己的许多政见有“未尽”之嫌。他与陈希彭论及时事,“证以列史治乱源,生所应对咸若发覆导壅,洞中时病。余方自愧阐论之未尽,乃愈嘉生之志而悦生之敏”^{[3]13-14}。不难想象,林纾的某些政见或许缺乏深思与洞见。

(二)在杭闽籍士人的社交网络与《茶花女》的顺利出版

“言说困境”让林纾忧闷不已,但在杭时期,林纾摆脱了这一困境。具体的时间,如《赠陈生序》中“光绪甲申迄于庚子”所言,为1900年。就在此前不久,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得以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学界已注意到现代出版在这一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高梦旦在此中出力甚多。^{[7]25-26}《茶花女》译成之后,好友魏瀚便出资聘请福州名手吴玉田将其雕版付梓。“该版刻成后,当时只印刷100部,分送林(纾)、王(寿昌)、魏(瀚)的亲友。”^{[8]414}因此,它在当时成为一种十分稀见的版本。大陆仅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福建省图书馆藏有该书。为了帮助魏瀚收回刻板的成本,早在“玉田本”尚在刊刻时,魏氏的学生高梦旦就致书汪康年,托其代售“玉

田本”。后者将《茶花女》刊载于《昌言报》并在《中外日报》等报刊上大力进行铅印本的预售宣传。1899年5月至12月,江苏、四川、湖南等地的友人不断致信汪康年求购这部小说。林纾的声望也随着小说流传逐渐传布四方。同年,著名诗人范当世见到林纾后,曾作诗赞道:

骚人欲炫芳兰佩,巧向樽前并一欢。
岂识廿年同味者,更从海外异书看。条
支弱水荒唐甚,碧海青天夜夜同。莫把
茶花问葩籍,言言都在国风中。^{[9]243}

所谓“言言都在国风中”,意在凸显《茶花女》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不仅是一种文学上的评价,也是对林纾本人品性的一种认同。《茶花女》在晚清士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士人们以诗词吟咏书中人物、情节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一种风潮。借由《茶花女》的流传,林纾不仅走出了“无人倾听”的尴尬,还成为声闻海内的名士。

林纾之所以能在杭州时期摆脱这种困境,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现代出版的介入,实际上还与晚清在杭的福州士人群体有关。在林纾到来之前,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杭州知府林启为核心,以时任桐乡县令方家澍、仁和县令陈希贤、海宁知县林孝恂、暂居于杭州的郭曾炘等为主要成员的官员群体。在这批官员身边,还聚集了一批同乡士人作幕僚、塾师,如高凤岐、高梦旦、林白水、方家澍(家澍弟)等。林纾正是以陈希贤家庭塾师的身份来到杭州。这个在杭的福州籍群体与浙江、上海等地的士人有着密切的往来,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社交网络。身在上海的汪康年就处于这张网络之中。从传世文献可知,他与林启、高凤岐、高梦旦等书信往还频繁。林启在杭期间,积极推行各项改良措施。如1897年,林启在杭州设求是书院与蚕学馆后,曾数次致信汪康年,或请其代为购买相关书籍,或求其介绍国内外的技术人士。汪也常致信林启,商谈相关事宜,并向求是书院推荐留学生员。时任林启幕僚的高凤岐、高梦旦就是在这过程中与汪相识。也是在1897年,高梦旦就曾委托汪氏代为印制林纾的《闽中新乐府》。^{[7]26}可以说,在杭福州籍士人群体与汪康年等人所形成的密切关系,为后来

《茶花女》的顺利出版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在林纾之前,已有人投身翻译并有所成果,周桂笙就是代表之一。他翻译了有关福尔摩斯的几部小说,但并未产生太大影响。钱钟书先生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翻译语言上的不足:“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2]80} 南宮搏则更多从外在的角度寻找原因:“当时上海滩文人不受官府和士林重视,而周桂笙这批文人既看不起官府,又轻视‘戊戌’那些政客,所以终究弄不出大名堂来。”^{[10]204-205} 在南宮氏看来,轻视官府和“戊戌政客”是周桂笙无法声名大噪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戊戌政客”,应是指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力并同情、支持或参与康梁变法维新的士人。与林纾过从甚密的林启、为林纾刊载小说的汪康年,在政治上都倾向于变法维新,似乎就是南宮氏口中的“戊戌政客”。林启在任期间曾对当地士子张宗祥青睐有加,张氏亦以师事之。据张氏弟子郑晓沧转述:“某次林于无意中笑问张师:‘你不属于保皇党吗?我们都是的。’师则以‘群而不党’答之,其时尚有他的幕僚高凤岐在座。”^{[4]13} 显然,林启口中的“我们”指的就是他与高凤岐。对比周桂笙与林纾的不同境遇,社交网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没有现代出版的介入,林纾或许会和周桂笙一样继续沉沦下僚,只能走上或塾师、或师爷、或幕客的人生道路,重复着同千千万万落第举人相似的命运,他翻译的《茶花女》不可能迅速为人所知,名震士林的盛举也不知要延后多少年。正是在杭福州籍士人群体的中介作用,使得《茶花女》得以顺利出版并引发轰动。困扰林纾多年的“言说困境”得以一夕消解,其影响力也逐渐流布全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上海、杭州的“戊戌政客”利用所掌握的出版事业话语权,将林纾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排。

二、翻译焦点的转移与林纾“言说方式”的确立

(一) 史传与林纾早期的翻译焦点

在“言说困境”消解的同时,林纾对于翻译的认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众所周知,在翻译《茶花女》之前,林纾就已开始尝试翻译外来文献。张俊才指出早在1895

年林母去世之前,林纾“就与他人合作翻译小说之事进行过一些尝试”^{[11]9}。另据邱炜菱记载:“若林先生固于西文未尝从事,惟玩索译本,默印心中,暇复昵近省中船政学堂学生及西儒之谙华语者,与之质西书疑义。”^{[12]408} 可见,林纾早就对翻译抱有极大的兴趣,只是当时还未重视其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而兴趣的焦点,在于史传而非全在小说。据邱炜菱所言:

又闻先生宿昔持论,谓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故尝与通译友人魏君、王君,取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士麦克全传属稿,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12]408}

“非先生志也”表明,《茶花女》的轰动效应,实在林纾意料之外。据邱氏转述,林纾将翻译看作“开中国之民智”的重要手段,所翻译的重点当是“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不过,文中所提及的“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士麦克全传”恐怕应算是史传或史学著作。早在来杭之前的1898年,林纾曾有过一个针对史传的翻译计划:

光绪戊戌,余友郑叔恭,就巴黎代购得《拿破仑第一全传》二册,又法人所译《俾斯麦全传》一册。《拿破仑传》有图数帙,中绘万骑屏息阵前,怒马飞立,朱批带剑,神采雄毅者,拿破仑第一誓师图也。吾想其图如此,其文字比英雋魁杰,当不后于马迁之纪项羽。问之余友魏君、高君、王君,均谢非史才,不敢任译书,最后询之法国人迈达君,亦逊让未遑。余究其难译之故,则云:外国史录,多引用古籍,又必兼综各国语言文字而后得之。余乃请魏君、王君,撮二传之大略,编为大事记二册,存其轶事,以新吾亚之耳目。时余方客杭州,与二君别,此议遂辍。^[13]

在想象《拿破仑第一全传》与《俾斯麦全传》中的内容时,林纾谓其“当不后于马迁之纪项羽”,即以《史记》比之。当他询问毕业于船政学

堂且通晓法语的魏瀚(魏君)、高而谦(高君,高凤岐二弟)、王寿昌(王君)等好友时,诸人皆“谢非史才”,即认为自己在史学上有所欠缺,不适合参与翻译。不难看出,在时人眼中,这两部外文书籍都属于史学的范畴。因而可知林纾所谓“翻译开启民智”的说法起初主要针对的是史传。

在《茶花女》出版之后,林纾依然希望能够翻译外国史书或政书。他在1899年5月15日给汪康年的信中道:

穰卿先生足下:初六日得沪上所发初三日手函,述《茶花女遗事》排印之由,将已津贴馆中经费。此举至妥至善,寸心想先生已曲谅之矣,慰甚。昨晚闻南洋电音,意船大至沙门湾,谅尊处已有所闻。意人舰队原来,枢府已面无人色,只有允之一字,再无他法。我生不辰,目睹恨事,又无半亩之田足以躬耕,于人迹不到之处,不见不闻,养得此心一日安静。今却光着身子听人家宰割,哀极痛极!近就陈吉士大令教读笔墨之馆,弟家累极重,藉以糊口。年底归闽,拟同魏季渚再翻外国史略或政书一部,成时当奉商也。^{[14]1160}

此前,《茶花女》的出版给林纾带来了一笔丰厚的收入,此可从林纾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看到:

昨阅《中外日报》,有“以巨资购来”云云。在弟游戏笔墨,本无足轻重,唯书中虽隐名,而冷红生三字颇有识者,似微有不便。弟本无受赀之年,且此书刻出诸魏季渚观察,季渚亦未必肯收回此款。兹议将来赀捐送福建蚕学会,请足下再行登报……^{[14]1159}

囿于“义利之辨”和翻译质量等原因,林纾对于广告中“以巨资购来”的说法颇感不安。然而,他“家累极重,藉以糊口”,翻译是为数不多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因此,他计划再与魏瀚等人合作,翻译一部国外的史书或政书。值得注意的是,在信中,林纾还表达了对于国家时局的忧愤。可知,此时的他已不自觉地将翻译与国家大事联系在了

一起。在传统士人的思维中,“政史”之类的著作比《茶花女》这样的“言情”小说更能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直到此时,林纾的注意力还未集中到小说之上。

(二) 林纾翻译焦点的转变及其原因

林纾注意力转变的开始,或许可追溯至1900年所作的《〈译林〉序》。在这篇序文中,林纾道:

今欲与人斗游,将驯习水性而后试之耶?抑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不善弹而求鵀灵,不设机而思熊白,其愚与此埒耳。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勤於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而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矣。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顾译书之难,余知之最深。昔巴黎有汪勒谛者,在天主教汹涌之日,立说辟之,其书凡数十卷,多以小说启发民智。至今巴黎言正学者,宗汪勒谛也,而卷帙繁富,万不能译。^[13]

此时的林纾已明确将翻译视为了解西洋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他认为只有通过翻译,“亚人”才能真正了解欧洲,进而“抗欧”。他又将“翻译”“立学堂”“立会演说”同列,视为“开民智”的三种基本手段。相比之下,译书是三者中最具可行性、见效最快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林纾十分推崇的法国人汪勒谛,正是“以小说启迪民智”的成功典范。由此,小说已然成为林纾心目中重要的翻译对象。

同年,林纾遇到了求是书院学员魏易。二人在杭州先后合作翻译了《英女士意色儿离鸾小记》《巴黎四义人录》和《黑奴吁天录》三部小说。其中,《黑奴吁天录》乃魏氏借于求是书院,仅用66天就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次年,林纾在北上入都后为该书作了序言和跋文。从中可知,当时在美华工遭受虐待一事正甚嚣尘上。斯托夫人笔下的黑奴与华工相似的遭遇让林纾既震惊,又忧愤。这构成了林、魏二人合译《黑奴吁天录》的一个基本背景。在序跋中,林纾一再声称这部小说“可

为前献”“足以儆醒之者”,对于本民族具有“警示”意义:

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即
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
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
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15]206}

虽然林纾依然认为所译小说“俚浅”,即不可与经史诗文等雅文学同日而语,但已明确强调是书可“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而“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一句,多少流露出林纾尝试的心态:他也不确定这种“借小说翻译言说己意”的方式是否会得到士人们的接受与认可。不过,林纾就此开始逐渐将自己对国家政事的见解注入到小说翻译中去。

在以后的二十余年里,他越来越自如地运用“以翻译小说言说己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各类见解,以期对现实有所补益。序言、跋文、注解等“副文本”成为他申说己见的重要空间。例如,1908年,为了消除国人对北洋水师“临阵畏敌”误解,他翻译了德富芦花的小说《不如归》,并以序言直陈己意:

余向欲著《甲午海军覆盆录》,未及
竟其事。然海上之恶战,吾历历知之。
顾欲言,而人亦莫信焉。今得是书,则出
日本名士之手笔。其言镇、定二舰,当敌
如铁山;松岛旗船,死者如积。大战竟
日,而吾二舰卒获全,不毁于敌。此尚言
其临敌而逃乎?^{[16]1-2}

在《不如归》第十八章末,他写道:“甲午战事,人人痛恨闽人水师之不武……今译此书,出之日人之口,则知吾闽人非不能战矣。”^{[16]80}北洋水师中多有林纾的同乡,他希望以这部小说为同乡死难者“正名”。

又如,他还着重发掘翻译小说中关于兵法的内容。其译《利俾瑟战血余腥记》,认为“是书果能遍使吾华之人读之,则军行实状,已洞然胸中,进退作止,均有程限,快枪急弹之中,应抵应避,咸蓄成算……则是书用代兵书读之,奚不可

者?”^{[17]15}在《不如归》中,林纾以“夹文”的形式于译文中多处进行注解,以明晰中日双方在战术上的得失。尤其是第十八章,仿佛是一场战争的“复盘”,同时他还多处强调“中国水师学生观之,兹可学也”^{[16]79-80}。林纾以小说言兵事,称自己的译作可用为兵书,其经世致用的意愿溢于言表。

至于这种“从史传转向小说”的原因,似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一探究竟。首先是当时学术思想的影响。1897年,严复等在《国闻报》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明确指出小说有“使民开化”之功。次年,梁启超亦有《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人们越来越多地留意到小说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巨大意义。已有学者注意到,正是随着清末文坛逐渐重视小说译介,林纾的翻译才逐渐兴盛起来。因此,林纾的这种转变极有可能是受到严复、梁启超的影响。^[18]其次是客观条件的制约。林纾不会外语,在翻译过程中对“助译”极为依赖。与《茶花女》不同,外国史传不仅涉及外国古籍,还需要综合多种语言方能明晰其中之曲折。这就对“助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正因翻译难度太大,林纾的友人们纷纷望而却步,甚至连法国友人也不愿接手。相比之下,小说翻译的难度要小得多。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林纾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小说方面。

三、结语

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较少关注杭州时段对于林纾的影响。然而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的首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得以出版,他遇见魏易并完成《黑奴吁天录》的翻译,此后又参与了杂志《译林》的出刊。上述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林纾翻译乃至其人生轨迹的走向。首先,受益于杭州地区的同乡社交网络,林纾依靠《茶花女》的出版摆脱了困扰其多年的“言说困境”并获得巨大的士林声望。其次,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及“助译”等现实条件的制约,为了更好地言说己见,林纾关注的翻译对象渐由西方政史著作转向小说,并“借小说翻译申说己见”,即于其中直接言说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在杭时期是林纾人生的一段重要转折,也为其后来的人生路径埋下了伏笔。

(下转第440页)